



COLECÇÃO CULTURA DE MACAU

澳门文化丛书

赵利峰 / 著

HISTORY OF GAMBLING IN MACAO DURING
CHINA'S REPUBLICAN PERIO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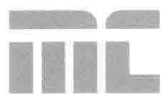
民国澳门博彩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COLECÇÃO CULTURA DE MACAU

澳门文化丛书

民国澳门博彩史

HISTORY OF GAMBLING IN MACAO DURING
CHINA'S REPUBLICAN PERIOD

赵利峰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INSTITUTO CULTURAL do Governo da R.A.E. de Maca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澳门博彩史/赵利峰著. -- 北京: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18. 12

(澳门文化丛书)

ISBN 978 - 7 - 5201 - 1729 - 6

I. ①民… II. ①赵… III. ①博彩业 - 经济史 - 研究
- 澳门 - 民国 IV. ①F7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3347 号

· 澳门文化丛书 ·

民国澳门博彩史

著 者 / 赵利峰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高明秀 王晓卿 袁绍珊

责任编辑 / 王晓卿 郭红婷 肖瑞宁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当代世界出版分社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0.25 字 数: 428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1729 - 6

定 价 / 11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国学大师季羨林曾说：“在中国 5000 多年的历史，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在时间上是明末清初，在地域上就是澳门。”

澳门是我国南方一个弹丸之地，因历史的风云际会，成为明清时期“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的桥头堡，并在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互动下，形成独树一帜的文化特色。

从成立伊始，文化局就全力支持与澳门或中外文化交流相关的学术研究，设立学术奖励金制度，广邀中外学者参与，在 400 多年积淀下来的历史滩岸边，披沙拣金，论述澳门文化的底蕴与意义，凸显澳门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2012 年适逢文化局成立 30 周年志庆，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澳门文化局精选学术奖励金的研究成果，特别策划并资助出版“澳门文化丛书”，旨在推介研究澳门与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学术成就，以促进学术界对澳门研究的关注。

期望“澳门文化丛书”的出版，能积跬步而至千里，描绘出澳门文化的无限风光。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谨识

目 录

绪 言 / 1

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澳门博彩业与澳门政治经济形势 / 9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澳门博彩业概况 / 9

第二节 清末粤澳关系日渐交恶 / 20

第三节 粤澳两地首次交涉澳门禁赌 / 29

第二章 澳门博彩业的蹭蹬岁月 (1912 ~ 1917) / 38

第一节 民国时期首家承充赌饷的启兴番摊公司 / 38

第二节 从“焚毁纸币”到“水灾善后”：广东开赌山铺票 / 46

第三节 民国初期澳门中式彩票承充困扰不断 / 60

第四节 鸦片取代博彩与澳门博彩业的日渐弱化

——赌城变身国际鸦片走私中心 / 77

第三章 赌王高可宁的崛起与其时代 (1917 ~ 1931) / 91

第一节 高可宁的出身与十友堂 / 91

第二节 广东弛禁番摊与甫开即倒的大兴公司 / 102



第三节 集益与集福番摊公司——高可宁时代的开启 / 115

第四节 “小巫与大巫”——沦为附庸的澳门博彩业 / 129

第四章 粤澳博彩业的竞争与冲突 (1931 ~ 1936) / 141

第一节 源源公司承充第六届澳门番摊始末 / 141

第二节 大有来头的范洁朋与源源公司倒盘后的按揭担保纠纷 / 162

第三节 澳门赌王高可宁的挫折与失势 / 181

第四节 挖墙脚的深圳赌场 / 188

第五章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与西式博彩的引进 / 203

第一节 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变化 / 203

第二节 澳门博彩业吸引赌客与改良服务的举措 / 216

第三节 澳门博彩业对西式博彩的引进 / 229

第四节 民国时期竞技类西式博彩的水土不服
——以澳门跑狗博彩为例 / 245

第六章 澳门博彩业的傅德荫时代 (1937 ~ 1949) / 266

第一节 1936 年的广东禁赌与傅德荫时代的开启 / 266

第二节 站稳脚跟的泰兴公司大获其利 / 281

第三节 风潮时期的澳门博彩业 / 293

第四节 战后的澳门博彩业日渐式微 / 313

第七章 关于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几点认识 / 349

第一节 民国澳门博彩业与澳门财政之关系 / 349

第二节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兴与衰 / 360

第三节 澳门博彩业与澳门社会 / 367

第四节 从博彩业到旅游娱乐业——澳门经济转型努力的新方向 / 388

附录一 民国澳门历届博彩业承充专营年表**(番摊、中式彩票承充总公司) / 406**

- 一 民国时期澳门历届番摊承充专营公司年表 / 406
- 二 澳门历届中式彩票承充专营大事年表 (1934 ~ 1949)
(签铺票、白鸽票和山票) / 407

附录二 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承充合同及章程选粹 / 411

- 一 1907 ~ 1912 年澳门承充番摊生意章程
(自 1907 年 7 月 1 日起至 1912 年 6 月 30 日止) / 411
- 二 1908 ~ 1913 年澳门仁慈堂与代售彩票人订立合同之章程 / 412
- 三 1914 年开收澳门氹仔路湾签铺票生意出投及合同章程 / 417
- 四 民国初年澳门大有山票公司开收山票章程 / 422
- 五 1926 年澳葡政府国课署开投番摊生意章程及合同章程 / 425
- 六 1929 年祥发公司山票章程与祥兴公司白鸽票章程 / 428
- 七 1931 年承充澳门氹仔路环山票、白鸽票合同章程 / 431
- 八 1934 年澳门氹仔路环开收签铺票、白鸽票、山票生意
合同章程 / 435
- 九 1937 年澳门番摊生意开投布告及承充合同章程大纲 / 443
- 十 1937 年澳门承充签铺票、白鸽票、山票章程合同文件汇录 / 446

参考文献 / 455**后 记 / 473**

绪 言

澳门迄开埠至今的发展历程，大致能以一个半世纪为时间段来分期。每一个阶段，澳门都有相应的名号，彰彰可表，分别是最初一个半世纪的“圣城”（The Holy City，在百年禁教前），中间一个半世纪的“东方之瑰宝”（Gem of the Orient Earth，作为西方人来华的安乐窝而得名），以及其后一个半世纪的“东方蒙特卡罗”（Monte Carlo of the Orient）。这些名号是概括澳门时代特征或者体现其城市功用性的生动表达，是澳门与周遭环境变化互动而产生的结果。每一个阶段，与之相应的澳门史研究重心和主题亦随之发生转移。在近代以来的澳门史研究中，博彩史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澳门博彩史研究是近现代澳门史研究的重心和主题之一。从近年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晚清时期的澳门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成绩喜人，这与同一时期的博彩史研究取得较大突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这一研究路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反观民国时期的澳门史研究，目前仍然较为薄弱。这不仅表现在研究成果数量上稀缺不足，在质的方面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未能尽如人意。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即是民国时期澳门史的诸多内部细节隐晦不清，研究找不到能够着力的抓手和破局的关键点。换句话说，没有抓住时代发展的主题，以至于大多数的著述无法擘肌分理深入下去，进而流于浮泛，甚至不期然而然地

落入中葡外交史或粤澳关系史的窠臼，整体认识上也无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错谬和误区。作为民国时期澳门史主要内容的博彩史，无疑就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有力抓手。

在民国年间，博彩业对于澳门不可或缺之重要作用越发凸显，澳门的赌城形象得到进一步彰显和固化。“东方蒙特卡罗”一语在晚清还只是西人笔下的一个中性词，民国时则不论中西报章言必称“东方蒙特卡罗”而语带嘲讽。毫无疑问，博彩业是澳门的经济基础，也是理解认识澳门历史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民国时期的澳门史就是一部澳门博彩业的发展史，不了解博彩史就无法准确认识和理解澳门史。

民国时期，澳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等领域的发展变化，不仅与博彩业息息相关，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唯博彩业马首是瞻。就经济层面而言，自澳门实施博彩承充专营制度以来，博彩业逐渐成为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龙头产业。澳门博彩业所缴赌饷在澳葡政府的财政岁入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据统计，其中至少有 22 年达到岁入 4 成左右，个别年份接近一半。博彩业是澳门经济的命脉，其他生业大多围绕着它转，已然形成了一个日臻完善的产业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譬如三位一体的烟赌娼生意，其他如饮食住宿、交通运输、旅游娱乐、当押银号等。靠博彩业谋生活者与日俱增。1896 年 2 月 13 日，澳葡政府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澳门博彩业的从业人数共计 601 人，约占各行业统计总数（6042 人）的 10%。到了 1947 年，澳门“直接间接依赖赌博为生者达 15000 人左右”。1949 年，香港《大公报》估计，“在澳门靠赌吃饭的人口占据澳门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倘若加上他们的家属人数，那么就是百分之二十四五”。同年，还有记者报道称：“没有了赌，澳门就不像是一个热闹的城市。据说有百分之四十的居民是从赌中捞生活的。”在这个主要由博彩业塑造的经济社会结构里，适时的澳门世家名流、富商大贾，几乎无人不与博彩业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或亲身上阵，打理经营，或幕后操纵，入股参与。而承充赌商获利发家后，又从博彩业中伸出触手，染指并操控了澳门许多行业，形成了一个以博彩业为中心的

无形网络。以与博彩业联系紧密的金融业为例，卢廉若家族开设的宝行银号、李际唐家族的宝得银号、萧瀛洲之宝裕银号、当押大王高可宁的富衡银号、黄豫樵的致祥银号、傅德荫的大丰银号等。虽说在民国初年和末年的数年中，澳门博彩业在澳葡政府财政收入中的风光地位一度让位于鸦片和黄金两项生意，然而细究其实，它们也与博彩业密切相关。比如，参与鸦片经营和黄金生意的主要投资者或其背后的重要推手，即是被称为赌王的高可宁、傅德荫等人。

从政治层面来说，民国时期的粤澳关系是影响澳门政治最为深刻的因素，而博彩问题则是双方交涉的一个重要内容。在1910~1949年的澳门历史中，粤澳（中葡）之间发生过三次严重的冲突，彼此交恶，几乎兵戎相见，最后都上升至终极的主权归属问题——收回澳门。清末两广总督张鸣岐时期的“赌一战以收回澳门”；陈炯明时期有“收回澳门的尝试”；抗战胜利后张发奎时期武装封锁澳门，有“一个师可以收回香港，一个营可以收回澳门”的说法，直接的肇因或者说深层的问题，都与澳门博彩业相关。在这三次交涉中，禁赌始终是一项重要议题。第一次，澳葡政府提出禁赌的条件是粤省每年补偿二十万两。第二次，澳葡政府对于禁赌的交涉，“一无回答，竟置若罔闻”。第三次，澳葡政府为保有澳门，不得不做出让步，松口同意禁绝烟赌，允诺至1949年年底“本澳赌业将可完全禁绝”。这是澳门博彩业发展史上首次付诸实施的禁赌行动。因禁赌问题而导致的交涉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使澳门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痛定思痛，心有余悸的澳葡政府开始思考如何处理博彩业与澳门前途的关系问题，谋划澳门经济转型并于20世纪20年代着手施行，对澳门此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社会层面来说，澳门博彩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塑造澳门社会的作用。博彩业易于致富，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博彩业既是澳门华商巨富诞生的孵化地，也是他们觊觎争夺的鼎中禁脔。澳门赌商借助博彩业这一聚敛财富的重要手段，崛起为澳门社会的中坚力量，如萧瀛洲、卢廉若、柯六、柯天泰、李镜荃、李际唐、高可宁、高福铭、范洁朋、黄叔



平、傅德荫等人，大多长期在镜湖医院、同善堂、澳门商会等华人社团组织中担任要职，成为澳门华人社会中的领袖人物。有的赌商甚至参与内地政治，比如源源番摊公司的范洁朋被选任为中华民国国大代表、中华民国澳门华侨区监督，成为名副其实的澳门华人领袖。澳门社会自身也因为博彩业而发生演变，赌商互相竞争，一代新人换旧人，不少华商通过博彩业实现了个人和家族的崛起，如民国时期叱咤一时的两位赌王高可宁和傅德荫。

民国澳门博彩业的发展对粤港等澳门周边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博彩业的发展使澳门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旅游休闲中心、香港的后花园。除了前面提到的因广东禁赌而要求澳门禁赌的交涉外，广东的开赌与澳门博彩业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澳门博彩业不仅影响到广东政府施政，广东博彩业的发展也牢牢地打上了澳门的印记。近现代的广东财政长期取给于博彩业，博彩业对广东政治、经济、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近现代广东成为民主革命策源地和民主革命大本营，博彩业与广东财政的互动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澳门博彩业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以往是为人所忽视的。此外，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扩张。因国内时局动荡难安，外辱内乱频仍，周边地区纷扰不断，澳门得益于其独特的政治地位，社会相对稳定，来澳人口日增，经济畸形发展，烟赌娼盛行，博彩业呈现一枝独秀之势。澳门演变为一个形象多变的综合体，既是庇护所和安乐窝，又是销金窟和梳打埠。在澳门博彩业发展的过程中，承充赌商利用其长期积累的人力、技术、经验和资本，将澳门博彩业影响的辐射范围渐次扩张，其发展并非仅局限于澳门一隅，其势力伸展的范围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且不论由澳门发售的各种中西式彩票流行于各地；承充赌商还到广东、香港、上海等地开设经营赌场，甚至远至东南亚。“东方蒙特卡罗”名副其实，“赌城”澳门成为中国博彩业拓展输出的重要发源地。

民国时期还是澳门博彩业发展历史进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东方的澳门与西方的蒙特卡罗成为双峰并峙的世界著名赌城。其

间，澳门博彩业跟随时代步伐，逐步迈向现代化。澳门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开始效仿蒙特卡罗的发展模式，将经济发展的中心转向旅游娱乐业，博彩旅游娱乐等设施的建设有了质的飞跃，多种西式博彩得以引进，乃是奠定当今澳门博彩业格局的源流所在。例如，民国时期澳门地标性建筑中央酒店的兴建，第一家博彩娱乐场（Casino）“濠兴”的出现，陆海空交通的改善，港口的现代化建设，西式博彩赛马、跑狗、轮盘赌等的引进，等等。与之同时，澳门博彩业的承充专营制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由分散走向集中和垄断。澳葡政府针对博彩业的改革使承充赌商承担了更多的社会义务，以回馈社会，如捐助教育等公益慈善事业、参与澳门城市建设、改善旅游交通等基础设施。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的发展介于传统与现代、中与西的交融演变过程中，有扬弃取舍，有推陈出新。这对于现当代澳门博彩业的发展，在管理制度、经营模式以及博彩形式创新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当下澳门博彩业中的不少现象在民国时期都能找到源头或影子。

民国澳门博彩史研究意义重大，它既是澳门史研究深入的桥梁，也是相关研究中的瓶颈，问题多，难度高，可以说触目皆是空白点。随便列举几个例子：

（1）民国乱世中起伏发展的澳门博彩业在澳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博彩业整体收益情况，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

（2）澳葡政府在博彩业领域有哪些政策变化？博彩业始终都是政府关注的重心吗？为何要建中央酒店？

（3）澳门华商的兴衰更替与博彩业有怎样的关系？澳门的世家大族卢家、柯家走向衰落的缘由是什么？高可宁、傅德荫家族又是如何崛起的？

（4）怎样理解澳门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博彩业之间的关系？

（5）澳门博彩业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如何？

（6）民国时期博彩业对现当代澳门博彩业的影响是怎样的？

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几乎没有人能给予清晰的描绘和诠释。尽管一些澳门史著述或有泛论及此，但它们常常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鲜

有深入探讨。坊间倒是有一些熟悉掌故的老澳门口耳相传的逸闻趣事，然而多是感性和表面的认识，加之时间久远，以及个人认识的局限性，记述内容互相矛盾，舛误百出，尤其是没有切实可靠的史料作为根据，其真实性和学术价值大打折扣。

从目前情况来看，涉及民国时期澳门博彩史的中文著述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澳门刘品良先生所著《澳门博彩业纵横》（香港三联书店，2002），澳人记澳事，该书勾勒了澳门博彩业发展历史的全景，内容大约和笔记掌故类似，颇具参考价值。不过，由于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缺乏必要的档案文献、史料注释，该书只能说是一本比较好的了解澳门博彩历史的通俗读物。至于学术研究论文，除了笔者所撰写的几篇论文外（《民国时期的澳门博彩公司钩沉》《民国时期的澳门跑狗事业》），就目力所及，至今依然鲜有相关论著问世。此外，坊间还有不少融合掌故之类的趣闻逸事演绎而成的赌城小说、传记文学等，其写作素材多引自各种文史资料中登载的回忆或口述类文章，如卫恭《八十年来广东的“禁赌”和开赌》、吴湘衡《我所知道的霍芝庭》、李汝宽《霍芝庭承办赌饷发家经历》、纪汝贤《深圳赌场》、立日选编《一代赌王——傅老榕》、明士《澳门博彩业巨擘——旅游娱乐公司》等。它们限于史料来源的单一，呈现出的只是历史的某一断面，内容支离破碎，语焉不详，史实真伪莫辨、纰缪百出，并不值得深论。至于其他语种的相关研究，葡萄牙学者的著述是主体。不过，民国时期的澳门博彩业基本上由华商主导经营，且以中式博彩为核心，因此，此类著作难以摆脱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羁绊，大多戛戛数语，泛泛而谈，存在以偏概全、挂一漏万的现象，缺乏系统全面的论述。例如，Antonio Duarte Pinho 的 *Gambling in Macau*，João de Pina Cabral（贾渊）的 *Monopólios do Jogo em Macau*；Pedro da Mesquita（麦百道）的 *A Santa Casa e as Loterias no Oriente*；*Lotarias com Todos*；Dawn R. LaRochelle 的 *Fiercer than Tigers: Gambling in Macao-Past, Present, Future*；Glenn McCarney 的 *Casino Gambling in Macao: Through Legalization to Liberalization*；等等。虽说春

兰秋菊，各有其妍，但对于澳门博彩史研究这样一个大题目，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而且在分量上也是远远不够的。

总的来看，民国时期澳门博彩史研究的现状是难以令人满意的。究其原因，除与民国时期的澳门史研究学术力量比较薄弱有关外，无外乎是相关史料依然比较稀缺，史料的整理开掘力度仍然不足，以及没有充分利用中葡档案史料（特别是度藏于澳门历史档案馆的葡文原始档案）。

近几年来，这一局面已有很大改观。在澳门大学汤开建教授等澳门史研究者不懈努力的倡导和推动之下，澳门史料的挖掘与整理工作取得了大幅的进步，既有档案文献、报刊史料收集范围的扩展，也有田野、口述史料新领域的开拓。例如，汤开建教授主持的澳门大学重大课题项目“全球视野下的澳门学文献调查与研究”，澳门理工学院启动的“澳门地方志”项目，澳门口述历史学会的口述历史类丛书，澳门基金会的记忆工程，等等。除此之外，史料的数字化工作也取得了长足进展，特别是澳门历史档案馆将《澳门政府宪报》和大量馆藏档案上载于网络，研究者足不出户即可加以利用，无疑给澳门历史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

除了文字史料开掘得到不断改善外，借助各类数据库和网络资源，以及拜访收藏家等方式，笔者十余年来收集了澳门博彩史方面的图片实物等史料，迄今已有千余张（件），不少图片为首次在澳门博彩史研究中使用。经互相比勘考证后的图片，弥补了档案等文献史料的空白和不足，为民国时期澳门博彩史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研究方法和逻辑思路，本书将以史料的开拓创新为取向，广泛而全面地收集、深入而细致地挖掘民国时期的澳门档案文献，如博彩承充合同的原始档案、《澳门政府宪报》以及民国时期在粤港澳等地发行的中文、葡文、英文报刊等。去伪存真，辨讹正谬，以扎实的史料为依据，从实证主义的角度入手，力图真实而准确地再现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争取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有全新的突破。同时，本书还将利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博彩业发展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与分

析，在微观上量化，以期使研究达到科学、规范的“数目字管理”的地步。

本书的框架安排以清末粤澳两地政府第一次禁赌交涉为起始。在纵向上，以承充澳门博彩业主体的番摊公司（依次为启兴、大兴、集益、集福、源源、泰兴）为论述主线；横向上，对不同时期执掌博彩业牛耳的澳门赌王高可宁、范洁朋、傅德荫等人进行详细的考查，同时上承清末民初的赌王萧登、卢廉若，下启当代的赌王何鸿燊。将澳门博彩业发展前后演进的脉络梳理清楚后，澳门博彩史之整体大观得以逐层渐次展现。有关细节内容方面，在考查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发展历史的过程中，着重解决前文提到的一些疑问。将重点论述两个问题——“制度变迁”和“经济转型”，即澳门博彩业承充专营制度的变革，各类博彩形式的演进与西式博彩的引入；赌饷收益与澳门财政的关系，博彩业在澳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澳门的城市发展定位，试图解决单纯依赖烟赌的经济转型等问题。

总之，本书力图重现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发展的历史图景，全面揭示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发展的历史概貌，填补了相关研究空白，将有助于解决制约民国时期澳门史研究中的瓶颈问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有关博彩业发展与澳门经济转型的问题，民国时期面临生存压力的澳葡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并采取措施着手研究发展方略，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其历史经验教训值得当今澳门社会借鉴参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澳门博彩业与 澳门政治经济形势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澳门博彩业概况

博彩，无论古今中外（或中式西式），按其使用赌具与否，^① 可将其形式概分为两种类型。尽管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博彩形式不断发展变化，时常有推陈出新之举，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其中之一是借助赌具作赌的博彩（亦可称之为“赌馆类”），以牌、骰等实物为主，大多是在赌馆或者赌场中，博徒与庄家面对面争胜互赌。如中式的番摊、骰宝等和西式的扑克、轮盘等，参赌的人数相对较少，可即时决出输赢胜负。另一类则可概括为以猜射为主的博彩（因最具代表性的为彩票，亦可称之为“彩票类”），大多以一纸票证为手段，博徒无须亲临现场，亦无专门赌馆之设。如中式的白鸽票、花会、闹姓、山票、铺票，西式的各种彩票、奖券等。此外，还有一些西式彩票形式的变态，诸如赛马、跑狗、回力球之类，参赌人数相对众多，大多需要一定时日，少则几个时辰，多则数天数月，才能决

① 赌具，指赌博用具。最早见诸正史记载的时间为元代。据《元史》卷一百五《刑法志四》记载：“诸赌博，因事发露，追到摊场，赌具赃证明白者，即以本法科论。”另，在近现代澳门博彩承充专营体系中，博彩分类即有中式和西式的分野（Jogos de azar orientais e ocidentais 或 Jogos Chineses e Europeus）。



出中彩输赢与否。

澳门博彩业的构成理所当然地从属于上述博彩形式。为便于进一步了解民国时期澳门博彩业发展的具体情形，有必要介绍一下澳门博彩承充专营的经营方式，再详细谈谈澳门承充专营的各种博彩内容类别。

（一）澳门博彩承充专营的经营方式

自 1847 年澳门博彩业出现以后，赌商投标竞取与政府授予承充专营权的互动模式逐渐成形。道光三十年三月（1850 年 4 月），澳门番摊赌馆的承充专营正式以竞投的方式招人承充，一名华商以每月缴纳 1000 澳门元赌饷，获得承充一年的专营权，^① 标志着澳门博彩承充专营制度的正式建立。竞标承充时需缴交一定的押金^②，投成后则需要有合同担保人或担保银，以保证承充赌商履行合同约定。至清末，澳门博彩业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且规范的承充专营体系，并且成为适时广东、港英政府效法借鉴的对象。

在晚清时期，澳门博彩业承充专营制度成熟规范化后，承充专营的主体名为“公司”^③。澳门博彩承充公司的出现是澳葡政府实施承充专营制度的必然产物。在晚清时期的广东地区，赌风之盛，甲于天下。粤港澳三地政府，都曾经弛禁赌博。开赌被视为一种“生业”，以此谋生者众多，在时人眼中已是视若平常的事情。起先，广东开赌或经营博彩业的机构一般被称为“某某堂”，这和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所经营的店铺堂号并无二致。例如，在葡萄牙东波塔的汉文档案中，提到道光二十

① Luís Quental, *O Fantan em Macau no o Século XIX, em Macau*, Agosto 1992; Jorge Forjas, *Famílias da Macau*, Fundação Oriente,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996, Vol. III, p. 542.

② 如 1881 年的番摊投充，其中规定“须先交贮银一万元，方准出声投价”。参见《澳门政府宪报》1881 年 7 月 2 日，第 26 号第 2 附报。

③ “公司者，数十商集资营运，赢则计本均分”。（清）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八，“道光十三年”，赵春晨点校本，中华书局，1989，第 182 页。